

□ 人物剪影

紧握手，相互拥抱，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原来你也是（党员）呀！”——无限丰富的内容都包含在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语之中。

1951年，我们搬家了。70多年过去了，如今，东黄城根62号已不复存在，拆建成漂亮、整洁的皇城根遗址公园了。

2015年，正值全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荣幸地获得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那沉甸甸、金灿灿的徽章拿在手里，抗战时期的紧张工作，东黄城根62号的日日夜夜，北平解放前我们地下工作者和敌人的较量，我和我的同学、战友情同手足的深厚情谊，像深深的刻痕，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2016年4月

张其锬：行胜于言 自强不息

○文爱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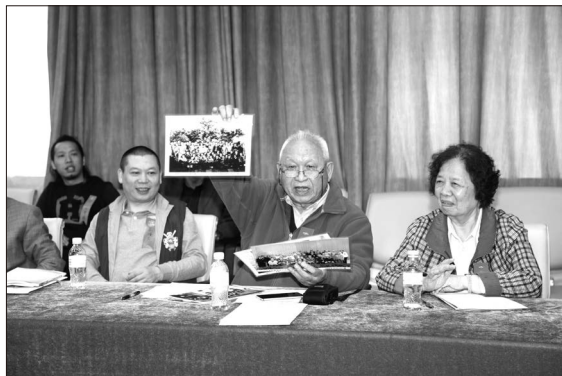
莎士比亚曾说过：“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天空中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规划专家张其锬走过的每一步，每一程，无不与书籍结“伴”而行。高中时，熟读曹禺的剧作，读英文原版的数理化教材；大学时，参加清华“秘密读书会”；工作中，广泛学习城市规划领域的新知识；“文革”下放农村期间，甚至买了一套农业书籍，钻研农业新科技；

改革开放后，又一头扎进遥感、计算机等新技术的知识海洋中。

与书为伴，甘之如饴。正因有了书籍的滋养，他就像一根不老的常春藤，永远焕发着蓬勃的生机。已88岁高龄的他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时刻关注城市规划新动态，熟稔遥感、GIS等新技术，紧跟时代节拍，日常生活中不断涌现的诸多IT新产品，都会玩、会用，难怪周边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为“现代化老头”。

苦难童年 师恩难忘

张其锬，祖籍江西新喻县（今新余县），清初移民四川，后定居重庆。1928年9月30日他生于四川遂宁，祖辈以经营药材为生。在战乱频仍的年代，偌大的中国几乎找不到一张安静的书桌。“我很幸运，求学路上遇到了很多好老师。”特别在1941年，张其锬考入重庆树人中学初中二年级。“它是中共地下党沙坪坝区的据点”，学校一



2016年校庆，张其锬学长（中）返校出席校友励学金十周年座谈会，右为贺美英老师

共有三位来自清华大学的老师，其中两位是中共地下党员，甚至连学校的董事长夫人也是地下党员。他的班主任黄绍湘，是“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骨干，清华大学的才女，后来是中国的美国史专家。

“她既是我的班主任、英语老师，又是我的革命启蒙老师。”在张其锬的毕业纪念册中，她写下“不要做温室的花朵”的警句，让他牢记一生。也是从黄老师这儿，张其锬第一次知道了清华大学，并开始追逐清华梦。

1943年，张其锬入读重庆清华中学。该校由清华老校友创办于抗战初期，曾任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秘书的傅任敢出任校长，是他把清华的教育思想移植到中等教育，使其成为重庆的一所名校。“重庆清华中学所聘教员大多出身清华、西南联大或其他名校，有真才实学，且为人师表。”提起恩师，张其锬赞不绝口，他还为纪念傅任敢校长发起清华大学傅任敢励学金，以资助家境困难的大学生。

1945年抗战胜利，张其锬正要上高三。这时，物价狂涨，不少商号、公司纷纷倒闭，父亲因此失业，无力支付孩子的学费。父亲到处借钱都无着落，张其锬陷入失望的深渊，一气之下得了急性胃炎，未及时返校。没想到傅校长托人带口信，问他为什么不到校报道。万般无奈之际，他找到傅校长说明情况，要求缓交学费。令他意外的是，傅校长立即同意，并在他的报告上签了字，这才办理了注册手续。

“重庆清华中学民主空气十分浓厚，是真正的素质教育。”他说，各党派的报纸学生都可以订阅，800多位同学中订阅《新华日报》的就有二三百人。学校要求

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这种环境熏陶下，学生思想活跃，眼界开阔，逐步养成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

清华逐梦 革命救国

1946年高考填报志愿时，出于对化学老师曾实的崇拜，张其锬同时填报了重庆大学、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三校的化学专业，皆被录取。“我是这么想的，万一没有路费，就上重庆大学；如果能筹措到路费，就到外地念。”清华大学第二个发榜，正当他为学费发愁时，一位曾受过他家帮助的初中同学伸出了援手，助他踏上北上求学之路。

9月中，张其锬睡甲板、住难民收容所、遇台风、搭煤船，整整走了45天，终于抵达梦寐以求的清华园，但开学典礼早已过。经校医室检查他患有“色弱”，不能念化学系，于是他转到物理系。当时清华有规定，理学院的学生必须选学一门社会科学课程，张其锬选了吴晗的“中国通史”，清华教务长吴泽霖的“社会学原理”，正是这两门课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丽的清华园不是世外桃源，从1946年底的“反美抗暴”学潮到1947年5月20日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给不少同学带来深深的困惑。1947年5月23日，物理系1946级部分同学成立了“读书会”。“读书会取名为‘戈壁草’，我们认为应当像戈壁草那样经得起酷暑严寒的考验，‘戈壁草’的成员们也因而自称为‘草民’。读书会首选读物为《大众哲学》。”张其锬是第一批成员。读书会曾多次在吴晗家召开学习讨论会。读书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前期主要是切磋革命理论和联谊

□ 人物剪影

交流，中期则以发动“草民”们积极投入清华园内的学运实践为主；到了后期，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斗争中。

大二时，张其锬转入土木系。在读书会活动结束时，他被介绍到清华剧艺社，同读书会一样，这也是地下党领导下的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强行进入清华园搜捕进步同学，部分剧艺社同学在去解放区途中被捕。他代表剧艺社和校方一起交涉、营救同学，还多次和社友一起到特刑庭草岚子胡同探监，送衣服、书籍等。清华成立迎接解放的文艺大队时，他是戏剧组的负责人。

1949年北平解放，需要紧急调一批在大学里从事文艺的骨干，组成北平市青年文工团，向广大青年宣传党的政策。3月5日，正上大三的张其锬被调出清华大学，到团市委筹委会报到，并成为文工团团部领导成员。6月，文工团受邀到中南海怀仁堂为新政协筹备大会召开做了精彩的演出，获得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不久，他们被重新分配，张其锬从事工厂和建筑业的青年工作。

规划释疑 还原历史

1949年北平解放，随即开始编制城市总体规划。1953年夏，张其锬调到北京市委，在北京市委副书记郑天翔同志手下当秘书。13年间，他亲历了许多重大的规划历史事件。作为见证者，他希望借此澄清一些世人误解，还原历史真相。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城市规划有不少争论，张其锬说：“很多人认为是彭真同志与梁思成先生的争论，实际上党内高层的争论是最主要的。”1953年第一个五

年计划开始，不少工程纷纷上马，而北京的规划一直定不下来。当时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既要应付当前建设用地和建筑设计方案的审批，又要制定总体规划。在这繁忙的情况下，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都委会副主任梁思成先生组织了甲、乙两个规划方案。甲方案是华揽洪、陈干提出的，乙方案是陈占祥、黄世华提出的。严格说，这也只是一个土地使用草图，没有市政、铁路等专项规划。

为了加紧制定规划，不影响当前建设，市委不得不亲自成立一个研究甲、乙方案的规划小组。组长是郑天翔，工作人员从各有关局抽调，储传亨、张其锬都长期参与规划小组。市委邀请苏联城市规划专家巴拉金参加了指导。关于规划小组的工作，张其锬介绍，主要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邀请各有关部门一起制定规划，包括邀请中央部门如交通部航运局、铁道部设计局、卫生部等很多单位参与规划。规划方案始终贯彻彭真同志“城市规划要有长远考虑，要看到社会主义远景，要给后人留下发展余地”的规划思想。规划也把经济、社会、文物保护等问题都考虑了进来，是一个综合的城市规划。

规划领导小组在甲、乙两个初步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中共北京市委于1953年11月将方案报送中央，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审议。国家计委党组于1954年10月16日对北京城市性质和规模提出不同意见：不赞成“强大的工业基地”的提法，认为人口规模大、道路过宽、绿地太多、人居居住面积指标9平米过高、建筑层数应以低层为主，不赞成发展文教区等。由于争论

激烈，中央决定邀请苏联城市规划专家来北京帮助规划。

1955年4月，以勃得列夫为组长，由有关城市规划、城市经济、给排水、供热、煤气和公共交通专家组成的苏联专家工作组到达北京，协助进行规划工作。为此，北京改组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都市规划委员会。市委组织工作班子，组建专业齐全的规划队伍。头一年大家基本处于学习阶段，听专家报告，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对过去的现状资料加以调查补充，动员全市力量详细调查了北京市的土地使用、工业、道路交通、园林绿化、市政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现状。回想当时热火朝天的调查场景，张其锬难抑兴奋：“交通的OD调查（起点到终点调查），动员了将近2万人，对每个十字路口八个方向的行人、机动车、自行车进行调查。”这是北京史上最详细最全面的一次现状调查。第二年才在详细调查和原有的方案基础上，制定了新的方案。在此期间举行过两次大型展览会，广泛地听取了意见。

“苏联专家不仅关注长远的规划，一些重大的建设问题，我们也及时向他们请教。”张其锬以北海大桥的改建为例。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北京市政府决定开辟第一条无轨电车线路。北海桥及两端道路由于现况复杂难于处理，成为改建的重点。苏联专家指导总体组制定新方案，也指导设计部门做出了保持原有风貌、改造旧桥的方案。苏联专家组还特意到现场踏勘、试验指导施工。针对市政工程计划无法统一安排，经常出现马路“开拉锁”现象，雷伯尼科夫专家就提出联合合理设的施工方法，把污水管、雨水管等分层合理埋设，

节约了大量的材料和施工成本。张其锬认为，在北京城市建设历史中，“有不少国际友人做过很多好事，他们是真诚无私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他们的功绩！”

现在有一种论点，好像一说起当年的苏联城市规划，就是落后的，只有欧美才是先进的。张其锬认为：“这个观点是不妥的。有人说北京的规划是抄莫斯科的经验，其实并不是这样。”首先，欧美的城市规划专家对上世纪五六十代的苏联城市规划经验也是肯定的。另外，在学习苏联城市规划经验时，我们并不是照搬照抄，而是结合了中国的国情。如苏联专家开始也认为东西长安街定的宽度太宽，天安门广场过大。市委领导多次和他们交换意见，并请他们参加劳动节、国庆庆典，他们也认识到中国人太多，最终同意了市委的意见。

关于中心城区“分散集团式”的发展模式未能实现，究其原因，张其锬认为，有规划部门控制不严的问题，但最根本的，还是我国城乡土地二元管理的土地管理制度所造成的。从1983年北京遥感图像看，中心城区基本上还保持了分散集团式的格局。改革开放后，因鼓励乡镇发展企业，这些用地由农口批准即可实施，于是大量隔离空间被蚕食。当市政府发现时，为时已晚。

工业调整 质量第一

1958年，万里同志调到北京任常务副市长，并分管城市建设与城市规划。郑天翔同志改为分管工业生产与工业建设。张其锬又随之转移到工业战线的研究上。“北京的工业建设与城市规划关系很密切。有两个重大事件需要提及，一是在工业大发展时，如何坚守城市规划？二是北京工业

□ 人物剪影

发展方针的转型问题。”

“一五”期间，中央考虑到国防，决定京汉铁路以东，不发展重大工业项目，因此在京建设项目较少。1958年中央成都会议上，毛主席才同意北京大发展工业。于是很多项目要到北京选址，都愿意离城中心近点。不少项目的筹备处负责人都是各部司局级干部，市规划局的干部应付不了。张其锬也给选址单位做工作。经反复动员，并带他们到新址查看条件，讲明优势，总算同意选新址。

与此同时，国庆十周年十大工程上马，施工力量、材料严重不足。到1958年7月份，开工面积达到300万平方米，其中三分之一陷入停工、半停工状态。天翔同志提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口号，对一百多个工业项目进行分析排队。只把12个项目列为重点突击项目；48个中小型项目开工早，抓紧收尾，及早投入生产；剩下的40%的任务列入第二批；把污染严重的项目，如大化肥厂、大电解铝厂都停建了。建设局面较快地变被动为主动。



2016年4月，张其锬学长等老校友返校参加活动。前排左起：王庸勤、张其锬、王浒、夏瑜、张思敬、李咏；后排左起：李彦、唐杰、钱锡康、于水、杨帆

1961年5月，毛主席在上海考察，肯定了上海提出的“高、大、精、尖”工业发展方向。天翔同志知道后，结合北京实际情况，提出北京工业应该把“大”字去掉，并提出“高、精、尖”以及精兵主义、精品主义的思路。为什么后来工业方针又演变为“高精尖、吃穿用、质量第一”？张其锬解释，天翔同志抓工业，除了抓冶金研究所，搞高温合金、导弹材料、电子工业等外，他认为在北京发展轻工业也很重要。北京的轻工业产品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基础和名声，比如牡丹牌的收音机、北京牌手表等。从“高、大、精、尖”到“高精尖、吃穿用、质量第一”，张其锬认为，实际上就是要提高北京工业发展水平，把产品的质量放在第一位，这是北京工业发展方针的一个重要转变。

航空遥感 技术革命

城市规划研究内容涉及经济、社会、环境诸多方面，不仅要了解它的过去、分析现在，还要预测未来。改革开放后，张其锬潜心研究航空遥感与计算机技术，探索如何运用于城市规划领域，并取得突出的成果。

1979年，张其锬调到北京市计算中心。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好在他的外文和理工科的底子还在，于是迎难而上，接受新的挑战。当时，中心已决定承担建设联合国援助中国的项目，筹建“北京国际经济信息处理与培训

中心”，张其锬被任命为国家项目主任。

1979年5月，张其锬率团到美国，参加联合国开发署对该项目购买大型计算机的招标活动，并考察美国用户的计算机应用。他们访问了哈佛大学计算机中心，中心主任透露：“学校有一个战略性的决定，即今后所有学生都必须学习计算机，计算机要渗透到各个学科。”在参观哈佛大学图形工作室时，他看到把各种社会经济统计分析数据都标示在地图上，并打印出来，也见到了遥感图像。他马上意识到计算机技术可以应用到城市规划，也可以渗透到多个学科和各个领域。因此，项目采购中也订了数字化仪和绘图仪等设备。1980年底，大型计算机安装后开始运行。1981年，北京市委领导参观培训中心，张其锬负责接待介绍。焦若愚市长认识他，知道他曾从事城市规划，就当面跟他说：“市政府要恢复城市规划委员会，你回来吧！”1982年初，他被调到北京市城市规划委员会任副主任，重新回到规划队伍。

回规委后，张其锬开始调查研究，在规划局管理处，他看到只有一些用得很破旧的地图，用铅笔标上拨地块。张其锬深深感到，改革开放后，北京建设规模逐年增大，用常规的办法根本无法完成这么大的基础数据的收集和地图的更新，必须另辟蹊径。当时卫星遥感图像的分辨率还比较低，难于满足城市规划的要求。于是他到国家图书馆查阅国外文献，终于找到答案。美国南加州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布蓝奇教授，一位将遥感应用于城市规划的著名学者，明确指出城市规划主要还是要用航空遥感技术。方向明确了，但张其锬也深知要在北京开展这项工

作难度很大。首先，北京是禁飞地区，必须经过中央批准才能飞行。其次，这完全是一门新技术，市领导不了解，城市规划部门也不熟悉。

正巧，地矿部领导之前专门出国考察了航空遥感的利用，并进口了大量设备，除了将遥感技术应用于地质方面以外，正考虑拓宽应用领域。经双方协调，邀请北京市和城乡建设部的领导参观了地矿部遥感中心，很快达成共识。两部一市联合开展“北京航空遥感综合调查”，代号“8301工程”，张其锬是负责人之一。尽管困难重重，但经过通力合作，历时四年，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项目调查课题多达41个，其中23项填补了北京资料的空白。由于课题众多，采取分课题分别鉴定的办法，完成一个鉴定一个，并向领导及时汇报，起到辅助领导决策的作用。如垃圾分布调查中，发现在750平方公里市区内，64平米以上的垃圾达到5190堆，四环以外占到75%，揭露了垃圾包围城市的真相。市政府连夜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很多成果都引起了领导高度重视，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与经济效果。

最后总成果在国家科委、国家计委联合主持下，进行了国家级技术鉴定，鉴定委员会的评价是：“在遥感信息应用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其成果对城乡规划、建设、决策、管理和立法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值得大力推广。”1987年，该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特等奖。

从1987年起，张其锬担任城市规划学会新技术应用学术委员会主任，主持在城市规划界推广遥感与计算机技术应用的任

□ 人物剪影

务，前后达 14 年之久。2001 年，他系统地总结了全国开展的情况与经验，撰写了《城市规划新技术的应用》一文，收录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德慈主编的《城市规划导论》中。

立德立行 水木情浓

张其锬常怀感恩：“我今天的一切，离不开党组织的培养与老领导的支持和帮助。”郑天翔同志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深刻地影响着；彭真同志的勉励，希望他能成为党内的城市规划专家；汪道涵同志的信任，当年赴美国考察前，送给他八个字：“相机行事，授权于你”。张其锬以诸多老领导的期望为动力，经过刻苦学习与努力钻研，开拓出一条新技术革命的道路。

当然，真正深入张其锬思想和灵魂深处的，非清华精神莫属。他认为自己受益于清华通才教育的思想。当年，清华要求理科学生必修一门社会学课程，这对张其锬影响极大，后来做城市规划时，他不仅仅从实体规划研究，也会考虑到经济、社会等人文方面的因素。

（上接第 90 页）

“文革”结束后，李蔺田重回教育部原工作岗位任职，进行职业教育探索。面对百废待兴，李蔺田率教育代表团多次出访美国及西欧，广泛了解国外职业教育最新进展，探索建立我国职业教育模式，并形成一系列建设设想及实施办法。1983 年，李蔺田响应党中央关于新老干部交替规定，率先离开领导岗位。

几十年来，李蔺田对中国职教工作倾注了全部心血，在各类教育杂志发表论文

近百篇。离休后一直担任中国职业教育学会领导工作，主编了中国第一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参与《当代中国·教育卷》编写领导工作，并在 90 岁高龄编著了《毛泽东领导管理思想研究》和《管理瑰宝》两本著作。

2017 年 5 月 14 日，李蔺田在北京逝世，享年 101 岁。他的一生是学而不倦的一生，追求真理的一生，渴望民族独立富强的一生，他认真做事，低调做人，我们永远怀念他。

不管身处顺境逆境，张其锬始终坚持学习。“文革”中，他被下放到顺义农村。先后阅读了作物栽培、农业气象、土壤、肥料、种子、农药等书籍，所以“别人下放是劳动，我是一边劳动一边搞科技”。他带领农民建立自己的接种室，培养出抗生素肥；他还引进杂交玉米、杂交高粱试种，均获得丰产。清华给予张其锬的不仅是一纸文凭，更是一种创新精神。正因此，已耄耋之年的他依然能紧随时代潮流，年轻人会玩的新玩意，他照样能玩，不少人都称他为“现代化老头”。

拳拳学子心，殷殷母校情。为回馈母校，自 1996 年起，张其锬发起、组织在重庆清华中学，开展“清华情”助学活动，资助家境困难的高中同学。20 年来，募集资金近 20 万元，共资助学生 75 位。为迎接清华大学校庆百年，他又参与和组织“解放战争时期老校友励学金”，资助贫困大学生。水木情浓，张其锬怀着一片赤诚的心，坚持用行动回报母校，回报社会。

（原载《北京规划建设》2016 年 6 期）

2017 年 6 月